



# From Trauma Display to Life Reconstruction

## —Post-Disaster Everyday Life and Glimmer Narratives in Yoko Tawada's *The Emissary*

Wenlong R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China

Email: 3059391719@qq.com

**How to cite this paper:** Ruan, W.L. (2026)  
From Trauma Display to Life  
Reconstruction.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13: e15827.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5827>

**Received:** July 29, 2026

**Accepted:** August 23, 2026

**Published:** August 26, 2026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Open  
Access Library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Abstract

Yoko Tawada's *The Emissary* constructs a near-future Japan in the aftermath of catastrophe and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depicting a post-disaster world in which ecological mutation, bodily disorder, social isolation,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re deeply intertwined.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primarily approached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criticism, dystopian narrative, bodil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ialectic between crisis and hope. However, further examination is needed of how these issues intersect and operate within the sphere of everyday life. Rather than treat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traum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fe as two successive and mutually substitutive stage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the novel, while continuously exposing pollution, physical suffering, and social oppression, gradually shifts its narrative focus toward the maintenance of post-disaster life, the formation of caregiving relationship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future possibilities. The novel embeds the consequences of catastrophe in such ordinary practices as eating, travelling, seeking medical treatment, receiving education, and using language, thereby transforming trauma into an enduring condition of everyday existence. Through Yoshiro's bodily care for Mumei, it further demonstrates how vulnerable lives can be sustained through relations of interdependence. Moreover, the imagery of candlelight, the clandestine activities of the "Emissary Society," and Mumei's eventual departure extend individual acts of care toward a broader public and future-oriented dimension. In this way, *The Emissary* establishes an interconnected narrative chain in which persistent trauma, everyday maintenance, caregiving relationships, and imaginaries of the future are mutually embedd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fe represented in the novel does not signify the restoration of a pre-existing social order; rather, it consists in sustaining life, preserving relationships, and keeping the future open amid vulnerability and uncertainty.

## Subject Areas

Literature

## Keywords

Yoko Tawada, *The Emissary*, Post-Disaster Everyday Life, Caregiving Relationships, Glimmer Narrative

## 1. 引言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后，日本文学中涌现出一批回应震灾、核污染与社会危机的作品，“后 3·11 文学”也由此成为当代日本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多和田叶子的《献灯使》是这一历史语境中的重要文本之一，其闭关锁国、语言禁忌和对外隔绝等设定，可视为对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社会风潮的寓言化回应。小说以灾难与污染之后的近未来日本为背景，通过闭关锁国、语言禁忌、生态变异以及老人不死、儿童羸弱等设定，呈现灾后社会秩序与生命秩序的双重失常[1]。作品以一百余岁的义郎照顾曾孙无名上学的一日生活为基本线索，将环境危机、家庭关系与未来想象嵌入饮食、出行、就医和上学等日常活动之中。

现有《献灯使》研究大致形成了生态与身体书写、社会语境与反乌托邦叙事、危机与希望表达三条阐释路径。在生态与身体书写方面，李雁南指出，作品有意避开“地震”“核灾难”等直接表述，而以“灾害”“污染”等词语扩展灾难的象征范围，使其超越狭义的“后 3·11 文学”，呈现出更具普遍性的后灾难文学特征；同时，小说也改变了传统生态文学中“环境决定身体”的单向叙事模式，构筑出“环境叙事中的身体”与“身体意识中的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2]。安西晋二则从“老龄”与身体、认知之间的差异出发，指出义郎不断以“污染”以前的过去对照当下的环境与身体变化，其既有价值观也在面对灾后环境和无名的身体时受到持续冲击[3]。高怡乐等则从生态批评与语象叙事出发，指出小说突破了传统生态书写范式，将叙事焦点延伸至非人类事物，从而呈现核灾难之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调整[4]。岩川ありき围绕“无名”形象展开分析，强调其并非单纯的病弱儿童，而是灾后世界中生命形态变化的重要节点[5]。增本浩子将《献灯使》视为震灾文学中的反乌托邦作品，指出小说虽然描绘了污染、锁国以及儿童身体衰弱的近未来社会，却通过无名作为“献灯使”走向海外以及语言不断获得新意义的过程，使这一反乌托邦世界仍然保留着面向未来的希望[6]。木村朗子将《献灯使》明确置于东日本大地震尤其福岛核事故后的震灾后文学语境中，并指出作品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核”“福岛”“放射能”等词语，却通过来源不明的“污染”、锁国以及表达受限等设定，使核事故后的社会现实以间接方式进入小说[7]。在危机与希望表达方面，侯冬梅指出，小说以社会危机为明线，以“献灯使之会”及“献灯使”为暗线，在严峻的现实危机与微弱的希望之光之间形成叙事张力[8]。中地幸进一步从“盖亚”想象出发，揭示作品中地球、生

命与未来共同体之间的内在联系[9]。上述研究为理解《献灯使》的生态意识与身体书写、反乌托邦特征、希望主题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对这些问题如何在具体日常生活中相互关联，尤其是饮食、出行、就医、教育、语言使用与代际照护如何共同形成灾后生活机制，并由此生成面向未来的微弱希望，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献灯使》并未停止展示污染、身体痛苦、生态异常与社会压抑，但作品没有将叙事停留在创伤的显影上，而是进一步关注灾难成为长期生活条件之后，人如何继续饮食、出行、就医、学习、说话并照护他人。由此，小说的叙事重心不再局限于“灾难发生了什么”，而是进一步推进到“灾难持续存在时人如何继续生活”。日常生活的维持、脆弱生命的照护以及未来可能的保存，也由此构成本文所要考察的核心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从创伤展示到生活重建”为分析路径，重新考察《献灯使》的灾后叙事。这里所说的“生活重建”，并不是指灾后社会秩序已经恢复，也不是指小说提供了明确的救赎方案，而是指在污染、隔绝、身体衰弱和制度失效的背景下，人物仍然通过照护、饮食、教育、语言和秘密行动维持生活、保存关系并想象未来的过程。本文所使用的“微光叙事”也并非一个既定理论概念，而是对小说希望生成方式的概括：它指的是作品并不依赖宏大的救世神话或确定的乌托邦蓝图，而是通过日常照护、语言命名、蜡烛仪式和“献灯使”派遣计划等微弱而持续的行动，在黑暗现实中保存未来可能的叙事方式。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从三个相互递进的层面展开论述。第一，考察灾难如何进入饮食、出行、教育、语言和空间秩序，转化为持续性的日常经验；第二，分析无名的脆弱身体与义郎的照护实践，说明照护关系如何在家庭结构松动和代际秩序倒置的情境中维持生命延续；第三，讨论蜡烛意象、“献灯使之会”及无名的出发，揭示作品如何通过意象复现、暗线铺垫和开放性结局，形成低强度、非英雄化且尚未完成的未来期待。本文认为，《献灯使》通过灾难后果的日常化、脆弱身体的关系化以及希望行动的微型化，建立起“日常维持－照护伦理－未来想象”的叙事链条，并由此在持续呈现灾难创伤的前提下，将叙事重心推进到生活维持、照护关系与未来想象。

## 2. 灾后日常的展开

《献灯使》的关键并不只在于呈现灾难之后的反乌托邦世界，而在于将灾难后果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具体环节之中。小说没有以地震、海啸或核泄漏的爆发场面作为叙事中心，而是从义郎与无名清晨起床、准备上学的一日生活写起。《献灯使》前半部分主要描写 103 岁的义郎在一个早晨照顾曾孙无名上学的故事，其中不断穿插义郎的回忆和对社会现状的叙述[2]。这一叙事安排使灾难不再作为一次已经结束的突发事件被回溯，而是成为人物吃饭、出行、上学和说话时无法摆脱的生活条件。小说的叙事重心由灾难发生时的震撼性场面，转向灾难长期存在之后日常生活如何继续展开。

义郎清晨前往“贷犬店”借狗沿河堤奔跑的情节，首先呈现出灾后日常的荒诞化。原本属于普通现代生活的晨跑，在小说中已经失去稳定的名称，

过去的“jogging”逐渐消失，被人们改称为“私奔”。(《献灯使》，第 18 页)这种命名变化延续了多和田叶子一贯的语言游戏，但其意义并不止于制造幽默。旧有词语的消失和新名称的错位，表明灾后社会对现实的认知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贷犬店”的存在意味着动物已经不再自然地生活在人类周围，而成为必须通过租借和商业管理才能获得的对象。小说写道，除了贷犬店以外，其他地方几乎已经看不到狗的踪影。高怡乐等也注意到，《献灯使》将叙事焦点投向动物、植物等非人类事物，使动物书写成为呈现核污染之后生态危机的重要方式[4]。义郎必须借助一只狗才能维持晨跑习惯，这一细节由此揭示出生态灾难如何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制度性安排，并重新规定人与动物发生联系的方式。

灾后生活的失常还进入家庭空间。小说写到，八叠间与厨房之间只是一个约两米宽的铺地板房间，其中放着野餐用的简易餐桌和钓鱼人的折叠椅；房间内的水罐中则插着一朵硕大的蒲公英。(《献灯使》，第 23 页)简易家具使居住空间呈现出临时、简化和勉强维持的状态，而巨大化的蒲公英又将生态异常直接带入室内。围绕蒲公英究竟属于“变异”还是“环境同化”，人们存在不同解释。(《献灯使》，第 24 页)这种争论说明，灾后社会不仅失去了稳定的自然环境，也失去了判断自然是否“正常”的统一尺度。蒲公英不再只是家庭空间中的装饰物，而成为核污染之后植物生命变化的可见证据。高怡乐等指出，小说中的植物并非被动的叙事背景，而具有呈现生态危机和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作用[4]。生态异常由此不再停留于户外自然界，而是成为人们每日观看、谈论并与之共同生活的现实。

食物书写是小说组织灾后日常的另一重要方式。义郎打开蜡纸，从中取出黑麦面包，面包因颜色、质地和味道而被赋予“牙惨”这一怪异名称。(《献灯使》，第 26 页)面包原本是普通食物，却在小说中同时关联着营养、异国记忆、语言禁忌和潜在危险。面包店主被称为“青春老人”，这一说法本身已经颠倒了正常的年龄秩序；义郎关于面包具有“人味儿”的判断，则暗示灾后世界中的感官经验和生活趣味也发生了微妙变化。(《献灯使》，第 27 页)食物不再具有稳定的名称、来源和属性，人们需要重新确认它能否被食用、能否为身体提供营养。小说没有通过大规模饥荒或物资争夺直接渲染灾难，而是借助一块面包表明，“活下去”已经成为一件需要被反复安排和确认的事情。

面包同时保存着封闭社会中的外部世界记忆。义郎与面包店主交谈时，每当说到外国国名，声音便不自觉地降低，仿佛需要确认周围是否有人。这一细节表明，对外隔绝并不只表现为航线、互联网和交通的中断，还内化为人物日常说话时的自我审查。面包店主认为面包使人想起遥远的外国，义郎虽然更喜欢米饭，却也承认“面包中有梦”。(《献灯使》，第 30 页)这里的“梦”已经超出个人口味的范围，成为封闭社会中关于异域和外部世界的残余想象。锁国状态下外来语的使用受到禁止，人们不得不用其他日语表达替换原有的片假名外来语；然而，“ジョギング”向“駆け落ち”等词语的转换，又使文字和语言从既定意义中被释放出来，获得新的表达可能[6]。从这

一角度看，小说中的语言游戏不只是形式实验，也是灾后日常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生活在词语的回避、替换和误读之中，同时又通过食物名称及其携带的文化记忆，保存对外部世界的微弱想象。

学校场景将灾后日常从家庭和市场延伸到公共生活。无名到学校后，墙上的宣传单、教师的讲座和关于古代生物的知识，都成为儿童认识灾后世界的重要渠道。义郎在小学围墙上看到关于“纳玛象”讲座的宣传单，回家后将这一名称写在日历上。无名每次经过日历，都会被“纳玛象”几个字吸引；小说还写道，只要听见活生生的动物名称，无名便会立即产生兴趣，仿佛动物会从名字中跳出来。（《献灯使》，第41页）在动物日渐稀少、自然经验不断萎缩的社会中，动物不再首先作为现实生命进入儿童的生活，而是通过名称、讲座和想象重新出现。学校教育因而不只承担知识传递的功能，也承担着保存自然记忆和外部世界经验的责任。

然而，语言所保存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稳定的自然世界，而是现实断裂之后留下的碎片。无名对动物名称的敏感，一方面显示了儿童对非人类生命的天然亲近，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联系已经被替换为间接的符号关系。语言在小说中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受到禁令、遗忘和替换的限制，又成为抵抗彻底失忆、保存世界记忆的媒介。正是在这种限制与保存并存的状态中，灾后日常表现出复杂性：生活空间不断缩小，现实经验日益贫乏，但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

由此可见，《献灯使》中的灾后日常并不是灾前生活秩序的恢复，而是在异常状态中勉强展开和重新组织的生活过程。动物成为租借对象，居住空间呈现出临时性，食物失去稳定的名称与属性，语言禁忌进入日常交往，学校则通过名称和讲座保存逐渐消失的自然记忆。小说通过这些具体的生活机制，将灾难从宏大的历史事件转化为持续性的日常经验。小说通过这些具体生活机制，使宏大的灾难事件转化为持续作用于日常生活的现实条件。作品在呈现废墟、污染与社会封闭的同时，也关注人如何在其中继续居住、进食、说话、学习并维持与世界的联系。灾后日常的展开，因而构成小说在创伤持续中转向生活维持的第一层叙事基础。

### 3. 脆弱身体与照护关系

灾难不仅改变了人们居住、进食和说话的方式，也直接进入人的身体结构。《献灯使》中最具冲击力的设定，是老人和儿童生命状态的倒置：老人无法正常死亡，仍然能够劳动和奔跑；儿童却普遍身体羸弱，难以独立完成基本生活。义郎这一代老人“没有人去世”，并不意味着他们获得了幸福的长寿。小说将老人无法正常死亡的寓言性设定与污染后的生命秩序失常相联系；与此同时，儿童“陆续患病”，甚至活跃的细胞分裂也被视为危险。老人不死与儿童早衰由此被组织为相互对应的身体图景，使生态异常、社会封闭与生命秩序失常在叙事中彼此关联。（《献灯使》，第9~10页）小说通过污染引发自然变异、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的连环结构，使人的身体同时承受危险自然环境和封闭社会环境的双重压力；身体的虚弱与倒错，因而可以被理解为外部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在生命层面的文学表征[2]。

灾后日常之所以仍能维持，并不是因为儿童身体恢复了正常，也不是因为医疗和社会制度已经重新发挥作用，而是因为义郎对无名持续不断的照护。本文所说的照护，并非泛指亲人之间的情感关怀，而是面对脆弱生命的具体需要，通过穿衣、饮食处理、身体辅助、就医陪伴和生活安排形成的持续责任。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无名生存，也在于根据无名的身体状态重新安排日常生活，并尽可能保存其作为行动主体的自主性。

无名的脆弱首先表现为基本动作的困难。小说开篇写他坐在榻榻米上，尚未换下睡衣，身体“头大、脖颈细长”，看起来像一只雏鸟；当手臂向上扬起时，又仿佛即将展翅。（《献灯使》，第17页）这种似人似鸟的身体形象，一方面呈现出儿童身体的异常和脆弱，另一方面也表明灾后生命已经难以用稳定的人类身体尺度加以理解。无名并非偶然患病的个体，而是这一代儿童身体状态的集中体现。

无名身体的脆弱在牙齿书写中表现得尤为集中。去看牙医时，他的牙齿模型被放在红色地毯上慢慢推动；当无名说“牙掉了，血出来了”时，义郎下意识地想把这句话改成“掉下来了”，试图减轻其中的不祥意味。然而，身体事实并不会因为措辞变化而消失。牙医指出，“乳齿的脆弱性会被恒齿继承”，义郎听后胸口仿佛被缝进一块大石头。（《献灯使》，第32~34页）这说明儿童身体的异变并非短暂病症，而可能持续进入未来。无名因缺乏吸收钙质的能力而无法咬断食物纤维，身体机能的退化使他逐渐失去独立行动和进食的能力。

面对同一身体事实，义郎和无名却表现出不同态度。义郎从掉落的牙齿中看到未来生命的断裂，无名则平静地反问：“既然早晚要掉，人为什么长乳牙呢？”诊疗结束后，他仍然礼貌地向牙医道谢。（《献灯使》，第32~34页）无名并非感受不到疼痛，而是不像义郎那样不断追问“为什么只有自己遭受这样的痛苦”。无名对身体虚弱和外部危险的接受，构成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智慧”；与沉浸于回忆和悲伤的义郎相比，无名以乐观和无怨的态度面对已经改变的世界<sup>[2]</sup>。因此，无名既是灾难后果的承受者，也成为小说重新理解身体、生命和主体性的关键人物。

这种身体危机还体现在营养吸收问题上。义郎曾为了让无名多吸收钙质，每天早晨让他喝半杯牛奶，得到的结果却是腹泻。牙医解释，如果内脏认为经口摄入的物质有毒，就会让毒质排出身体。（《献灯使》，第35页）正常生活中被视为营养来源的牛奶，在无名的身体中却可能转化为需要排斥的危险物质。食物不再天然地滋养生命，身体也不再自然地接纳外部环境。对于无名这一代儿童而言，水果、蔬菜和受到污染的海洋鱼类都可能发出“危险信号”，生活空间被逐渐压缩在由老人精心维持的安全范围之内。

这使照护不再等同于按照既定知识提供食物，而成为不断观察、判断和调整的过程。义郎不仅要为无名准备食物，还必须根据其牙齿、内脏和身体反应，决定食物能否入口、是否需要浸泡和切碎。照护因而不是抽象的亲情表达，而是一种建立在身体差异和现实不确定性之上的生活实践。

儿科检查的描写进一步显示出身体、制度与家庭照护之间的关系。无名去做定期检查时，医生不再使用“定期诊断”这一说法，而改称“每月一

见”，因为“诊断”的发音容易使人联想到“震断”。医生检查眼睛、手掌、皮肤、头发以及耳鼻，并询问义郎是否需要检查细胞受损程度。儿童健康资料也不由医院统一保存，而是由医生手写后通过飞毛腿送往医疗研究机构，再由研究机构决定隐藏地点。（《献灯使》，第 36~38 页）医疗体系并未完全消失，却已经失去稳定、公开和连续的制度形式。它能够监测和记录儿童身体，却无法真正恢复其身体功能。制度只能提供有限的检查，无名每日的生存仍然主要依赖义郎的具体照护。

义郎在帮助与放手之间的选择，体现了照护关系的复杂性。无名早晨穿衣时，义郎虽然担心他不会提前准备衣服，却仍然对他说“你自己穿，我不会帮你的”，同时又将一整套衣服放在曾孙面前。（《献灯使》，第 22 页）义郎并没有完全替代无名行动，而是在提供必要条件之后，为无名留下自己完成穿衣的空间。他照顾无名的身体，却没有把无名彻底固定为一个无能力者。照护在这里不是单向施予，而是在保护与自主、帮助与放手之间不断调整的关系实践。

食物处理则使这种照护深入到身体功能层面。无名牙齿脆弱，面包只有在液体中泡软后才能吃下，义郎还要为他切断难以咬碎的食物纤维。（《献灯使》，第 40~41 页）义郎的手、刀具和经验共同补充了无名无法充分完成的咀嚼功能。无名缺失的身体能力并不是由技术完全取代，而是由另一个人的身体和行动加以承担。从这一角度看，义郎的身体成为无名身体的延伸，灾后生命也不再表现为独立、自足的个体，而是表现为不同身体之间的协作和相互依赖。

这种照护关系还改写了传统家庭伦理。无名的母亲在生下他后去世，父亲飞藻行踪不明，祖父母迁往冲绳，曾祖母鞠华也长期与义郎分居，家庭中实际只剩下义郎和无名。（《献灯使》，第 84~86 页）《献灯使》中“老人不老、儿童早衰”的生命倒置造成了代际断层，并伴随着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淡化[10]。无名也并不急于了解自己的父母，即使在学校，同班同学中也几乎无人由父母双亲抚养，“母亲”“父亲”不再成为儿童共同谈论的话题。没有父母的儿童甚至不再被称为“孤儿”，而被改称为“独立儿童”。（《献灯使》，第 94 页）这一名称看似强调儿童的独立，实际上却遮蔽了儿童在尚需照料的年龄失去父母陪伴的处境。

不过，小说并未简单停留在传统家庭关系消失的悲观判断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义郎与无名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建立在确定的血缘之上。飞藻在无名出生后才回来，并对孩子是否属于自己表示怀疑。无名与义郎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确定的血缘关系。然而，义郎并未因此削弱对无名的照顾，反而从无名身上闻到吃奶婴儿般甘甜的气息，并认为如果无名的父母无法陶醉于这种气味，那么便可以看作是大自然选择自己成为无名的父亲。（《献灯使》，第 119~120 页）

这一判断使照护从狭义血缘伦理中部分脱离出来。义郎不是因为首先确认了无名的家族归属才决定承担责任，而是因为一个脆弱生命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需要有人回应其具体需要。灾后伦理的核心由此不再只是“谁属于谁”，而转向“谁愿意持续承担照护”。血缘家庭虽然已经残缺，但照护行

动重新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责任联系。

因此,《献灯使》中的身体异变并不只是为了制造反乌托邦的恐怖感。老人不死、儿童早衰、牙齿脱落、食物难以吸收和医疗制度失序,共同构成灾后生活的身体基础;义郎对无名的穿衣帮助、饮食处理、就医陪伴和情感回应,则使脆弱生命仍能继续生活、学习并保留一定自主性。灾后生活的重建并不是建立在身体恢复正常的前提上,而是建立在脆弱身体与照护身体之间的相互配合之上。无名也不是在摆脱依赖之后才成为未来的承担者,而是在持续的照护中被保存下来,并逐渐显现出通向未来的可能。

#### 4. “献灯使”的希望指向

既有研究已经注意到《献灯使》中的危机与希望结构。侯冬梅认为,小说以灾后社会的多重危机为明线,以“献灯使之会”及“献灯使”为伏线,使严峻危机与希望之光交互显现[8]。丁瑞媛、洪晓云同样指出,作品以“危机”为明线、以“献灯使”为暗线,在黑暗现实中探寻可能的出路[10]。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关注的是,这种希望并非以完整、确定的救赎方案突然出现,而是如何从日常照护、语言命名、灯火意象和秘密行动中逐步生成。

小说中“献灯使”的出现并不突兀,而是通过一系列看似普通的日常细节加以铺垫。义郎在面包店买面包时,面包店主让他购买一把刀,以便将食物切碎,为无名补充营养。义郎随后买下制刀者的自传,书中反复出现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作者在日出之前起床,点燃蜡烛进入工作场地,并且蜡烛的规格被写得格外具体——直径五厘米,高十厘米。《献灯使》,第39~40页)刀具首先服务于义郎对无名的饮食照护,蜡烛却又暗示某种尚未被揭示的共同仪式。希望并不是脱离生活突然降临,而是潜藏在买刀、切食和点灯等微小行动之中。

同样规格的蜡烛随后出现在鞠华的生活中。鞠华习惯在天还黑时起床,当太阳即将越过地平线时,便用火柴点燃桌上直径五厘米、高十厘米的蜡烛。《献灯使》,第96页)蜡烛规格的精确重复,使制刀者自传与鞠华的日常工作形成了明显照应。“献灯使”在鞠华和夜那谷的视角中被先后提及,使寻找“献灯使”的隐线逐渐浮出水面;小说中的面包店主、卖刀者、鞠华和夜那谷等人物,也通过蜡烛仪式被暗中连接起来。因此,蜡烛不仅具有希望象征,还承担着叙事线索的功能:原本分散、看似无关的人物和行动,因同一物象的反复出现而形成隐秘关联。

这种写法使希望在小说中呈现为一种逐渐显现的结构。作品没有开篇直接介绍“献灯使之会”,而是先写买刀、切食、制刀者自传和清晨点灯,到后文才正式揭示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希望由此不是以公开宣言进入叙事,而是通过物象复现、线索埋设和延迟揭示缓慢形成。蜡烛的光亮本身十分有限,不能立即照亮整个黑暗世界;但正是这种有限、重复和持续的光,构成了小说希望表达的基本尺度。

“献灯使之会”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延续了这种微弱而分散的特点。无名十五岁时第一次听说“献灯使之会”,夜那谷老师告诉他,这个组织没有会报,不举办大型集会,一般只是三四个人在私人住宅中商量事情;它不收会

费，也没有会员证，总部设在四国，却分散为八十八处，没有固定场所。(《献灯使》，第 151 页)这一秘密组织几乎不受世人注意，却依靠会员共同遵守的点灯仪式维持联系，其成员在危机中默默寻找并培养适合成为“献灯使”的儿童[8]。

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组织相比，“献灯使之会”没有稳定中心、公开身份和统一制度。它的力量十分有限，却没有因此放弃行动。当国家制度以闭关锁国、言论控制和文化排斥封闭社会时，人与人之间仍然可以通过秘密信任、小规模协作和共同仪式保存联系。希望在这里并不表现为强大的制度替代，而首先表现为拒绝将封闭现实视为最终结局。

“献灯使之会”的意义，还在于重新打开日本与外部世界之间已经被切断的通道。小说前文不断写到外国航线停航、互联网消失、外来语受到排斥。义郎曾创作历史小说《遣唐使》，却因书中使用外国地名而无法发表，最后只能将作品埋入地下。(《献灯使》，第 26 页)“遣唐使”的被埋葬，象征着日本曾经主动走向外部世界、学习异域文明的历史记忆遭到压抑；“献灯使”的出现，则通过与“遣唐使”的同音关系重新激活“出发”的可能。

“献灯使”这一题名本身就是对“遣唐使”的改写，而“灯を献ずる使者”这一词义又使其获得了希望的意味。“遣唐使”向“献灯使”的转换，也体现了作品通过语言变形生成新意义的方式[6]。“献灯使”与古代日本派遣遣唐使寻找发展道路的历史相呼应，寓意灾后日本再次通过走向异国寻求突破[4]。不过，两者并非简单重复。“遣唐使”主要服务于国家和文明层面的交流，“献灯使”所携带的则是灾后世界中脆弱生命的经验。出发不再以国家强盛为目的，而是为了保存生命、重新连接世界并寻找尚不确定的未来。

无名被选为“献灯使”，与他的脆弱身体和特殊感知密切相关。他牙齿脆弱、身体迟缓，饮食和出行都需要义郎照护，但小说并没有将这种脆弱完全处理为缺陷。无名面对咳嗽、呕吐、疼痛和身体迟缓时，并不像义郎那样持续陷入悲伤和恐惧，而是将这些经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在义郎看来，无名能够从上一代人避之不及的迟缓和羸弱中感受到生活的幸福，这正是“迄今为止的孩子们所完全不具备的新型智慧”。(《献灯使》，第 46 页)

无名的新型智慧建立在对自身虚弱和外部危险的接受之上，是一种超越现实、面向未来的身体意识[2]。义郎往往从衰弱、痛苦和未来风险的角度理解无名的身体，无名自身却并不始终以悲观方式理解这些经验。他甚至能够从迟缓和身体的不便中感受到生活的趣味。两种感知方式之间的差异，使“脆弱”在小说中不再只是需要克服的负面状态。无名之所以被选择，正是因为这种从迟缓和羸弱中感知生活的“全新智慧”，使他成为黑暗世界中的希望承担者。

因此，“献灯使”的希望具有明显的非英雄化特征。传统灾难叙事往往期待强壮、有力的拯救者，以速度和行动能力突破困境；《献灯使》却让一个身体虚弱、行动迟缓且长期需要照护的孩子承担未来。无名并非站在灾难之外拯救他人的英雄，而是灾难后果本身的承受者。他所携带的不是征服危机的力量，而是在脆弱、依赖和不确定性中形成的另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希

望由此不再建立在强者救世的逻辑上，而是建立在脆弱生命被保存、被尊重并获得行动方向的基础上。

小说也没有把“献灯使”计划写成确定无疑的救赎方案。无名将被秘密送往印度的“马德拉斯”，但作品直到后文才透露这一目的地。（《献灯使》，第151页）从表面看，马德拉斯意味着日本重新连接外部世界的可能，但其名称本身又包含历史错位。由此，“献灯使”同时具有希望与不确定性的双重意义：它既指向出发和改变，又无法保证航行一定成功，外部世界也未必能够提供最终救赎。

这种不确定性并没有取消希望，反而构成本文所说的“微光叙事”。小说所呈现的不是一个已经找到答案的世界，而是一个答案尚未出现、但仍有人愿意寻找答案的世界。“献灯使之会”没有公开权力，无名没有强健身体，马德拉斯也不是稳固可靠的终点，但小说依然保留了行动和出发的可能。希望不再等同于必然胜利，而表现为拒绝提前关闭未来。

“献灯使”的希望也不是与义郎的日常照护相互分离的另一条线索。义郎的照护首先解决无名“如何继续生活”的问题，使他能够进食、穿衣、就医并成长；“献灯使之会”则进一步赋予这一被保存下来的生命以公共和未来意义。没有义郎长期的日常照护，无名无法成为“献灯使”；没有“献灯使”的未来指向，照护也容易停留在单纯维持生命的层面。个体照护与共同体行动由此形成连续关系：照护保存生命，秘密组织连接生命，无名的出发则使被保存的生命获得面向未来的方向。

因此，《献灯使》中的希望并非凌驾于灾难之上的明亮结论，而是在灾后日常和脆弱身体中缓慢生成的微弱方向。蜡烛意象的反复出现，使分散人物形成隐秘联系；“献灯使之会”的延迟揭示，使希望从日常细节中逐步浮现；“遣唐使”与“献灯使”的语言转换，重新激活了走向外部世界的历史记忆；无名的非英雄形象和马德拉斯的不确定性，则使希望保持开放和未完成状态。灾难进入日常，照护保存生命，而“献灯”使被保存的生命获得走向未来的可能。作品由此形成了一种低强度、分散化、非英雄化且尚未完成的微光叙事。

## 5. 结语

综上所述，《献灯使》虽然以灾难和污染之后的未来日本为叙事空间，呈现出闭关锁国、生态异常、身体失序与社会关系断裂交织而成的反乌托邦图景，但作品的意义并不止于展示灾难创伤。小说更值得重视之处，在于它将灾难后果沉入饮食、出行、上学、看病、语言和家庭生活等日常细节之中，使灾难不再只是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成为持续作用于个体生活的现实经验。由此，作品完成了从“灾难发生了什么”到“灾难之后如何继续生活”的叙事转换。

在这一转换中，脆弱身体与照护关系构成灾后生活重建的核心。老人失去死亡能力，儿童却身体孱弱、行动迟缓，正常的生命秩序和代际关系被彻底颠倒。无名的身体危机并未使小说停留于绝望，相反，义郎对无名的持续照护使脆弱生命得以被维持、被尊重并被送往未来。与此同时，“献灯使之

会”的秘密行动、清晨点燃的蜡烛以及无名即将出发的计划，又使个体照护进一步延伸为共同体层面的希望想象。小说中的希望并非宏大的救世神话，而是在日常维持、代际照护和微弱行动中生成的“微光”。

因此，《献灯使》的文学价值不应只被理解为后 3·11 灾难经验的反映，也不应仅仅归结为生态批判或反乌托邦书写。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持续呈现灾难后果的同时，将后灾难文学的关注重心推进到生活维持与关系重建：灾难进入日常，照护维持生命，献灯指向未来。小说没有轻易提供救赎答案，却在废墟般的现实中书写人如何继续吃饭、行走、学习、命名世界并想象出发。正是在这些低微而持续的行动中，《献灯使》呈现出一种柔弱却坚韧的希望，也为后灾难文学提供了关于日常伦理、生命延续和未来想象的独特表达。

##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 References

- [1] 多和田叶子. 献灯使[M]. 蕾克,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
- [2] 李雁南. 身体意识与环境叙事: 生态批评视域中的《献灯使》[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184-192.
- [3] 安西晋二. 多和田葉子「献灯使」に描かれた〈老い〉: 身体と認識の差異[J]. 國學院雜誌, 2019, 120(7): 21-34.
- [4] 高怡乐, 孙立春. 从生态批评看《献灯使》中的语象叙事[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5, 33(5): 203-205.
- [5] 岩川ありさ. 変わり身せよ、無名のもの: 多和田葉子「献灯使」論[J]. すばる, 2018, 40(4): 164-173.
- [6] 増本浩子. 希望に満ちたディストピア: 多和田葉子の震災文学[J]. DA, 2019(14): 53-67.
- [7] 木村朗子. 放射能災の想像力: 多和田葉子「献灯使」のかたること[J]. 2018 年度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学内共同研究: ポピュリズムとアート, 2019: 103-108.
- [8] 侯冬梅. 危机主题与希望使者: 日本“后 3·11 文学”中的《献灯使》[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9(5): 65-71.
- [9] 中地幸. 多和田葉子の夢見るガイア—「献灯使」論—[J]. 都留文科大学大学院紀要, 2025(29): 63-79.
- [10] 丁瑞媛, 洪晓云. 多和田叶子《献灯使》的危机与希望主题研究[J]. 东北亚外语研究, 2021, 9(3): 27-32.

##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 从创伤展示到生活重建

#### ——多和田叶子《献灯使》的灾后日常与微光叙事

**摘要：**多和田叶子的《献灯使》以灾难与污染之后的近未来日本为叙事空间，呈现出生态变异、身体失序、社会隔绝与关系断裂交织而成的灾后世界。既有研究多从生态批评、反乌托邦叙事、身体变异及危机与希望等角度展开讨论，对上述问题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彼此关联，仍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本文不将创伤展示与生活重建视为前后替代的两个阶段，而是考察小说如何在持续呈现污染、身体痛苦与社会压抑的同时，将叙事重心推进到灾后生活的维持、照护关系的形成及未来可能的保存。小说将灾难后果沉入饮食、出行、就医、教育和语言使用等生活环节，使创伤转化为持续性的日常经验；又通过义郎对无名的身体照护，呈现脆弱生命如何在相互依赖中得以维持；并借助蜡烛意象、“献灯使之会”的秘密行动及无名的出发，使个体照护获得公共和未来指向。由此，《献灯使》形成了创伤持续、日常维持、照护关系与未来想象相互嵌合的叙事链条。其所呈现的生活重建不是既有秩序的复原，而是在脆弱与不确定之中维持生命、保存关系并使未来保持开放。

**关键词：**多和田叶子，《献灯使》，灾后日常，照护关系，微光叙事